

| 【 中医文献的海外传播 】 |

法国学界对中医古籍的研究

贾瑞杰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熠熠生辉，吸引着欧洲美洲及亚洲其他国家的学者。中医作为中国文化中的一部分，更是得到了全世界学者的关注，来华的药剂师、传教士和医生不仅将西医传到中国，亦将中医传播到西方。

最早把中医古籍介绍到欧洲的一批人，其身份先是与中国做生意的商人，此后是传教士，最后才到专业医学界人士，这个历程大约是 700 多年。波兰耶稣会来华传教士卜弥格（Michael-Pierre Boym，1612—1659），在中国和西方的交流史上有着重要的位置，他第一次将中国的中医、中药介绍到了西方，在 16—18 世纪中国文化西传欧洲的文化交流中，有着重要的贡献。卜弥格将《黄帝内经》、《脉经》，对中医中草药的介绍以及他的中医研究传向西方。他于 1656 年在维也纳出版的《中国植物志》（*Specimen medicinae Sinicae*），用当时欧洲医学通用的拉丁语出版，引起各国重视。《中国植物志》（*Specimen medicinae Sinicae*）是欧洲出版的第一部中国植物学专著，其中收录 29 种生长在东南亚和中国的动植物，每种植物卜弥格都仔细标注其葡萄牙文或拉丁文和中文名称，生长区域、形质特征、药物制作方法、治疗的疾病和销售情况。动物中有凤凰、野鸡和像鹿又像虎的麝。1663 年法国作者、科学家、地图绘制者和东方学者特维诺（Thévenot, Melchisédec，1620—1692），在他编辑的法文版《旅行导论》（*Relations de Divers Voyages Curieux*）一书中收入法文版的《中国植物志》。目前国家图书馆有《中国植物志》《旅行导论》的缩微文献。

中草药的运用是中医治疗疾病的主要手段及理论精髓之一。明末清初来华耶稣会传教士们对之非常感兴趣在许多译著中介绍了中草药包括产地、药性和功效等。清朝初期入华的法国耶稣会士巴多明（Domonique Parrenin，1663—1741）在那个时代的中西文化科技交流活动中成果卓著。他研读过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并通过书信方式向欧洲传播了大量的中国医学知识，在西方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促进了西方世界对中国科学技术的认识与了解。巴多明在 1723 年致法兰西科学院诸位先生的第二封信中介绍了关于中药冬虫夏草、三七、大黄、当归、阿胶的性能、制药及服用，并写到这些都是他跟随皇帝出巡满洲地区见到的植物。其中冬虫夏草是法国科学家最感兴趣的，冬虫夏草的神奇药效让来华的传教士大为惊叹。巴多明对冬虫夏草的形态有着十分细致的刻画，巴多明在该信函中也说明了冬虫夏草生长于西藏，而在川

藏交界处虽然也可找到,但数量极少。后来在杜赫德(Jean-Baptiste Du Halde, 1674—1743)的《中华帝国全志》(*Description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中也收录了上述中药,显然是根据巴多明的通信编写的。

另一位法国传教士殷弘绪(Francois-Xavier d'Entrecolles, 1662—1741)在华传教期间,也对中医药颇有研究。在1726年5月写给杜赫德神父的信中他介绍了自己在一本中文名为《益寿术》读到的中国药物,其中包括芝麻、葛根、芍药、金银花、辰砂和雄黄,简要介绍他们的医疗功效。例如他介绍葛根时提到它能够退高烧治剧烈的头痛和严重的关节炎还可以发汗、祛毒,还普遍用来治儿童发热引起的所有病。他还将中国的柿子、荔枝、槐树、柳树的药用作用介绍到欧洲,甚至把柿子的种子也一同邮寄给远在法国的杜赫德神父。殷弘绪还将中国人种痘方面的知识传到了欧洲,他于1715年5月10日在饶州写给德布鲁瓦西亚神父(Père de Broissia)的信中提及了中国的种痘术。他在1726年写给杜赫德神父的信中也介绍了中国人的种痘方法并且肯定中国的种痘技术比欧洲先进。殷弘绪介绍中国的主要信件被杜赫德所采用,被编入了《中华帝国全志》。

1711年4月,法国耶稣会传教士杜德美(Pierre Jartoux)致印度和中国传教区总巡回使的信中对人参的产地、形状、生长状况、采集都进行了描述。

法国学界对中医的研究中《本草纲目》占有重要位置,根据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 1900—1995)的考证,1720年法国医生范德蒙德(Jacques François Vandermonde)赴澳门行医,1732年得到《本草纲目》。于是他对照书中所载药物,采集了80种矿物标本,占《本草纲目》中矿物总数的百分之六十,又在中国人的帮助下,根据《本草纲目》所述,对每种药作了说明,给出其中国字,逐个作了标签,并编了一份材料,题为:“Eau, feu, terres. etc. métaux, minéraux et sels, du pen Ts'ao Kang MU”(《本草纲目中水火土金石诸部药物》),属于《本草纲目》原文的不完全翻译。但遗憾的是,范德蒙德带回的矿物标本及《本草纲目》早期摘译稿,没有得到关注。直到1839年,法国汉学家毕瓿(Edouard Constant Biot, 1803—1850)才关注到范德蒙德采集的矿物标本,他请他的友人化学家亚历山大布朗涅尔(Alexander Brogniart)对标本作了化验,并将化验结果发表在巴黎的《亚洲杂志》(*Journal Asiatique*)上,1896年德梅里(F. de Mely)和库日尔(M. H. Courel)才把范德蒙德1732年在中国人帮助下完成的《本草纲目》金石部法文翻译稿发表出来,稿件积压了164年才最后问世。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1896年法国巴黎出版的德梅里(F. de Mely)《中华金石》(*Les lapidaires chinois*)。

《本草纲目》第一个法文节译本出现在1735年巴黎法文版《中华帝国全志》(*Description*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 的第三卷中, 此书共四卷四册, 对开本, 全名为《中华帝国及华属鞑靼之地理, 历史, 年代记, 政治, 以及科学全志》(*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 historique chronologique politique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中华帝国全志》是那个时代中国国情汇总, 涉及中国的地理、历史、政治、经济、科技、宗教、教育、语言、文学、民俗、物产等, 几乎无所不包, 这部有关中国的百科全书是由巴黎耶稣会传教士杜赫德根据当时 27 名在华传教士 (包括卫匡国、南怀仁等) 寄来的稿件编辑整理而成, 此书在欧洲流传甚广是当时西方了解中国的重要文献依据。该书于 1735 年在巴黎首刊, 共 2500 页。《中华帝国全志》1735 年法文版卷三第 437 页起, 介绍了中国明代本草学家李时珍编纂《本草纲目》一书的作者、成书过程、书的主要内容以及书的价值, 并进一步说明了《本草纲目》的分类法, 对其 16 部、60 类本草都一一进行了介绍。此书还摘译了《本草纲目》的部分内容, 将《本草纲目》卷首部分摘译成法文, 标题是: “Extrait du Pen Tsao Kang Mu, C'est-a-dire de l'Herbier chinois ou historier naturelle de la Chine, pour l'usage de la médecine.” 中文意思是《节录本草纲目: 即中国本草学或中国医用博物学》。其中对茶、茶籽、海马、石蟹、麝香 5 种药物的翻译来自法国传教士白晋 (Joachim Bouvet, 1656—1730) 的手稿; 有关象、骆驼、虫白蜡、乌柏木的翻译源于法国传教士刘应 (Claude de Visdelou, 1656—1737) 的手稿而对五倍子的翻译或出自法国传教士殷弘绪 (Francois-Xavier d'Entrecolles, 1662—1741) 的手稿。《中华帝国全志》较为全面、系统地介绍了《本草纲目》的主要内容、编纂目的和编写体例, 使欧洲读者通过阅读《全志》能够对《本草纲目》有一个整体的了解。

《中华帝国全志》这部巨著以“中国人的医术” (The Art of Medicine among the Chineses) 为名译介了三部中医药典籍, 是最早系统介绍中医药的西方经典。第三卷不仅长篇节译的李时珍《本草纲目》还收入了王叔和《脉经》以及根据石成金的养生著作《长生秘诀》译介的《长生, 获取健康而长久的生命的技巧》 (*Tchang seng, ou l'art de se procurer une vie saine et longue*)。《中华帝国全志》中还介绍了阿胶、五倍子的用途, 记述了人参、茶、海马、麝香、冬虫夏草以及云贵川的山芪、大黄、当归、白腊虫、乌柏树等 16 种药材。通过此书法国学界以及整个欧洲都开始了解了中国中医药学, 《中华帝国全志》在巴黎出版之后很快于 1736 年和 1746 年分别在海牙和纽伦堡又推出了两个法文本, 对 18 世纪的欧洲学者了解中国文化起了重要作用。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杜赫德《中华帝国全志》1735 年首版以及 1736 年再版。中医的脉诊也深深吸引着来华传教士们, 精通汉学的利玛窦 (Matteo Ricci, 1552—1610) 详细介绍了中医的治疗方式细致讲述了中医考核医生和传授医术的方法。他也同样影响了欧洲

人对中医的兴趣。他说“中国的医疗技术的方法与我们所习惯的大为不同，他们按脉的方法和我们的一样，治病也相当成功。”欧洲学者从传教士的报告中得出结论：中国医生具有“高度的脉搏测量技术，非精通其术者无法想象”。法国启蒙思想家狄德罗（Denies Diderot，1713—1784）在其《百科全书》（*L'Encyclopédie*）中有“脉搏”一节，其中记录到所有旅行者的记载都显示，这个国度（指中国）的医生的医生具有神奇的脉搏测量技术。波兰传教士卜弥格重点研究了《黄帝内经》和魏晋医学家王叔和的《脉经》。法国人哈尔文（Harvien.P.P）在南明永历年间将王叔和《脉经》的手稿译成法文，于1671年在巴黎出版，名为《中医秘密》（*Les secrets de la médecine des Chinois consistant en la parfaite connaissance du pouls*），1686年门采尔（Adolf von Menzel，1815—1905）将这部脉学手稿发表在纽伦堡科学年鉴，取名为《中医钥匙》。《中华帝国全志》第三卷也收有传教士赫苍壁（Julien-Placide Herrieu，1671—1747）参与译介的高阳生《脉诀》。

针灸西传是中医西传的重要内容之一，针灸在西方世界的传播，起源于法国，而法国的针灸又起源于昆明。法国外交官苏里耶·德·莫朗（George Soulié，1878—1955）于1906至1909年在法国驻云南府（即现昆明市）领事馆任副领事期间，曾关注、学习、使用过针灸，回国后从1927年起向法国医生传授针灸临床技术，由此，西方针灸开始从法国逐渐向整个西方世界的传播。苏里耶在1939年出版了《针灸法》（*L'Acupuncture chinoise*），书中前言部分介绍了他学习针灸的经历，苏里耶抵达北京不久，就遭遇一次霍乱流行，死者无数。他见有位医生能很快用针止住患者的吐泻、抽筋，于是他借助当局的介绍及自己流利的汉语随其学习基本针法、重要穴位及脉诊，后来他又到上海以及云南结实了许多针灸师继续深造，他留下的著作，直到今天还影响着西方针灸界。

巴多明、殷弘绪和1687年后来的传教士们，通过一封封信件，向西方介绍了中医文化的博大精深，彰显了中华文化的独特价值，推动了欧洲学者们对中医文化的认知和了解。法国汉学家雷慕沙（Jean Pierre Abel Rémusat，1788—1832）就因为读了卜弥格的《中国植物志》而对中医产生了浓厚兴趣，开始潜心研究。1813年，他完成了关于中国医学《论中国人的舌苔诊病》（*Dissertaio de Glosso-semeiotice, sive de signis morborum quae è lingua sumuntur, praesertim apud Sinenses*）的博士论文，这篇论文的灵感便来自于卜弥格的“舌译”译文。

中医学作为世界医学的一部分，在数千年发展历程中不断向周边及其他国家传播，中医与世界其他文明逐渐融为一体。法国作为欧洲最主要的国家之一，是西方文化的代表，法国作为中医在西方传播的重要发源地，理应成为西方中医学传播研究的开端。